

■新作聚焦

## 胡世宗、陈广生长篇传记文学《雷锋传》

## 一部具有素朴之美的史诗

□范咏戈

在纪念雷锋逝世50周年的日子里,学习雷锋的宣传又兴起了一股“热”,在这股出版热潮中,除《雷锋日记》《雷锋的故事》修定再版外,又新出了《雷锋日记选》《雷锋全集》《雷锋箴言》《雷锋精神学习读本》《乔安山忆雷锋》以及长篇小说《雷锋》等等。但是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胡世宗、陈广生所著的《雷锋传》置于其中,不难发现它不仅十分抢眼,而且不可替代。这是用传记形式原汁原味还原雷锋、并给予雷锋精神准确解读的一个优秀文本。

首先这本书的作者可谓强强联合。作者之一陈广生十分熟悉雷锋,《雷锋传》里写到的雷锋参军后的那位俱乐部陈主任就是陈广生本人。雷锋生前,陈广生曾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并与人合作写出了《雷锋的故事》,此后还写了多种关于雷锋的作品。另一位作者胡世宗也是与雷锋同属一个军区部队的战友,是一位激情的诗人和文笔优美的报告文学作家,此前也有多种有关雷锋的作品问世。这种写作身份或者说写作优势他们很难拥有,《雷锋传》不是那种趁时之作,而是作者长期写作雷锋的一次汇总和升华,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和厚重。

本着对传主雷锋的尊重与了解,《雷锋传》在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雷锋方面做了新的努力,取得了新的成功。《雷锋传》结构非常简单,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在家乡起步”,中篇是“在鞍钢淬火”,下篇是“在军营里成长”,把雷锋短促的一生分为这样三个阶段是相当准确的。人的精神生成离不开特定发展阶段和生长环境,人本身就是环境的产物。《雷锋传》展现了雷锋在家乡、在鞍钢、在部队,即在农村、工厂、军营三种不同生活环境中的成长,由一个“报恩”的苦孩子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生命历程。在雷锋精神生成的清晰思想脉络和雷锋的心路历程中,读者明晰地感受到雷锋精神的三个要点:报恩、进取和自觉。雷锋作为一个受尽旧社会欺凌的孤儿,是翻天覆地的解放救了他。从他懂事起就遇到了来自共产党的恩人彭乡长和县委张书记。“我是个孤儿,共产党救了我,解放军救了我,我热爱新社会,新社会是个大家庭,我只想着怎么为新社会做点事,在新社会我看到谁都是我的亲人。老师像我的妈妈,同学们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老年人都是我的爷爷奶奶”。这些发内心的话语解密了雷锋特有的家国情怀。他不同于一般人有个人小家的幸福和局限,雷锋始终把国家集体和他融为一体。所以无论他在望城县委当通讯员还是在鞍钢当工人、在部队当战士,他都充满着大爱情结

和对党、对人民报恩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愿望驱使下他做了那么多克己利他的好事。《雷锋传》对雷锋精神成因的解释顺理成章又切中肯綮。在家乡根治沂河水的工程中,他带病战斗在风雨里;在望城县团山湖农场,他一下子就捐出20元钱,是他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和准备买被子的钱;在鞍钢,工友马大伟的钱包丢了,雷锋就在饭堂里号召大家募捐,他自然又是捐得最多的;参加业余演出队被“淘汰”后他就甘心拉大幕,给大家烧开水;听说国家困难,该领的袜子和军装都不领了;用小罐子回收洒在车上的水泥;星期天他不是上街,而是“装”作肚子疼去小学建筑工地运砖;给战友乔安山的母亲寄钱;为受灾地区捐款,存折上共203元,他取出200元;困难时期伙食定量,他把饭让给战友,事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我虽饿点,让他吃饱,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敌对友对人民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追求,标志着雷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成熟。

《雷锋传》让读者看到了在雷锋身上,或者在雷锋精神中,“让”与“争”、平凡与伟大、单纯与丰富的辩证统一。这既是本书的独特视点,也是亮点。正因为雷锋是一个十分进取的青年,他短暂的人生才跨出了极大的步伐,实现了跳跃式的人生发展。在望城县给张书记当公务员,他对骑马打枪充满着好奇,而且都自我尝试;他成为望城县第一个拖拉机手;听说鞍钢来招工,不安于现状的雷锋又从南方到艰苦的工业第一线,实现了他人生的另一次转折。到鞍钢后分配他开推土机,别人一年出徒,他4个月就提前出徒,一下提前了8个月。1960年征兵工作开始后,他那个要当兵保卫祖国的少年梦又被重新唤起。当年是因为年龄太小被拒绝,这次是因为和部队要求的个头分量都不够标准,但经过死磨硬缠,特别是在《矿山报》上发表了一篇《我决心应征》的文章。他动情地写下:“我是个孤儿,我苦大仇深,为了不要让人们再有身上的伤疤请求批准我当兵。”部队首长为之所动,破格将他征收入伍了。当兵以后苦练投手榴弹,由不及格到优秀;被分配到汽车连后,他又成为最先出徒的汽车驾驶员,并且琢磨出制作模拟汽车教练台,解决人多车少、训练时间少的矛盾。在高小时,他第一个加入少年先锋队,后来又第一个加入共青团。入伍10个月就入了党,这在和平建设

时期部队党的建设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接着又被提升为班长。这些人生经历之外,《雷锋传》又让我们看到了这和雷锋那种“钉子”学习精神不无关联。他喜爱文学,读书滋养了他,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丹娘》,这是他能够比他同代人进步快的原因。这种进取和勇于尝试的精神也表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赶时髦”买皮夹克、穿皮鞋、用雪花膏等等。可以说雷锋在那个时代属于“时尚达人”,这一点符合他的年龄特点,也是雷锋精神能够为今天的青年所接受、所认同的一个原因。

向善也好,进取也好,都说明雷锋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融入了时代精神。《雷锋传》凸显了雷锋身上那种自觉的公民意识。他本人是政府和社会领养大的,因此他把自己比喻为一颗“螺丝钉”、一颗放在什么地方都发光的螺丝钉。雷锋不属于自己轰轰烈烈的伟人,他是从日常中造就出的伟人。他就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一个青年,他自己践行的理念是做好事不留名。这样做他内心是满足的,是幸福的,这是雷锋精神令人震撼之处。

《雷锋传》竭力摒弃政治说教,避免把雷锋仅仅作为政治典型解读。雷锋作为一个从普通人行列中走出的伟大人物进入读者视野。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种精神文化符号、能够超越不同社会和意识形态壁垒走向世界的原因。中国军人中确实有非常多的典型,但是像西点军校能够将他和驰名世界的将军并提,就说明雷锋以正确选择道德行为、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追求真善美的人格为基本特征,所反映出的中国文化精髓,其既深邃又平淡的内涵,是具有超越宗教、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软实力。它所包含的真诚价值像阳光一样成为人类永恒的需要。历史上那些优秀的传记都具有朱东润先生说的,在现代传记家所提出的“真实、个性、艺术”之传述三要素之外,又加上“祖国”这一要素。传记文学的精神是充分写实,但在写实中还要抒情,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就是要抒发爱国之情。《雷锋传》用充分写实的笔墨,传达出来的却是作者澎湃的激情和理性认识的深刻内涵。每一章节中,《雷锋传》都精心选择雷锋语录或诗歌镶嵌在文本中,使《雷锋传》给读者以一种立体的阅读感。相信这是一本能够传之久远、对当代精神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具有史诗之美的力作。

## ■关 注

日前,有人在微博上晒出诗人乌青(原名郑功宇,1978年出生,兼小说、影像作者)的3首诗作,即刻被转载逾万次,造成轰动。对此乌青在微博上回应:“最近两天受到的赞扬和非赞扬比我过去30多年加起来的还要多7000多倍,说实话我有点羞涩。”为了表示感谢,乌青还特地创作一首《我火了》:“我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最近我在网上火了/是吗?我媽不会上网,真的吗?/真的,我亲爱的妈妈/这次我绝对没有骗你/我媽听了很高兴,然后呢?/然后我就不火了。我说。”

有意思的是,“乌青体”因其话语的流行性,早在几年前就引起笔者的关注与批评,我在《新世纪5年网络诗歌述评》(《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中指出:入选《中国网络诗典》的一首《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带有网络诗的普遍毛病,在充满嬉戏和口唇快感后面,它只是副词(真、很、非常、特别、极其、简直)的堆砌,没有形象可言,只是“白”的抽象平涂,除了带给读者检阅众多副词的“新鲜感”,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有人认为这就很不錯,它带来区别纸媒诗的某些“新美”特色,这就够了,而我要说的是,它充其量不过是能指漂浮的游戏,决不能被捧为网络诗歌写作的“典范”。

在《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笔者再次把矛头指向入选年度选秀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是李白写的”。笔者原以为这位成熟的诗人要对我们的诗仙进行戏拟、消解,殊不知他只是把大诗人原作抄了一遍,最后加上一句所有中学生都知道的“版权署名”。试想,我们把《春望》《在狱咏蝉》《过故人庄》……分别复制一遍,最后一句再标明这是杜甫、这是骆宾王、这是孟浩然写的,岂不是三四年级小学生在抄写家庭作业?玩要乎?无聊乎?反讽乎?不管作者“深意”如何,设想作者在自己开设的网站上,也同意人人都来这么一手,将是一种怎样的灾难?!

遗憾的是,人们对此并不以为然,反而在几年之后变本加厉,争相模仿,同时惊呼“赵丽华有了接班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对白云的赞美》作于1999年,而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等一批还要稍晚一点(或接近于同期),这是一种“反季节”式的不谋而合。网民们的误判应该纠正一下,否则捷足先登的乌青体还得忍受一次委屈。

历史常常会开玩笑,“拔得头筹”者反而“滞后”。但从本质上说,乌青体和梨花体都同属于废话写作范畴。作为“语感”写作的始作俑者之一杨黎,推动了大陆口语诗潮,但继“语感”之后他的“废话”提法——“废话是诗歌的本质”,“说一千道一万,不就是‘言之无物’吗?‘诗啊,言之无物’(《打开天窗说废话》)。由于自身准确性问题——基于“语言有用而诗歌无用”的这一负面性的“曲解”扩散,造成“口水诗”泛滥。看来,在语感诗与废话诗的推动上,杨黎的功过各占一半。

回溯2006年,口水乱象达到高峰,排山倒海的“梨花体”仿写运动,点击率逾百万,创下诗歌关注度前所未有的记录。在混乱中,我们发现,众多网站、网民起哄、围观和娱乐本身——其巨大的俗文化能量,大大削弱了诗歌深层“问题”的探讨,却在媒体的“怂恿”下,不断演化为连续的噱头、闹剧。恶搞与混战一直持续到年底。这次机遇,本来是中国诗歌洁身自好的机会,是对口水诗废话诗的清算——如董泽撰文严厉批判废话主义其实质是极端的形式主义、极端的随手随意、极端的故做高深和极端言之无物的伪诗歌。包括赵丽华本人在其声明中的反思:“我个人的好诗标准,依然坚持我以前的观点,那些人性的、客观的、本真的、有奇妙的好味道的、有汉语言的原初之美、有伸展自如的表现能力、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和翅膀的诗歌我认为才是好诗。”然而,由于网络本身的“失控”,许多问题没有进一步澄清,致使时隔不到6年,沉渣泛起。一方面表明诗歌界自我清洁力量的欠缺,另一方面也体现网络狂欢不可穷期。

仍有持相同立场的少数诗人力挺。如诗人周亚平说:“乌青让诗回到渺小中来,让我们自己也回到渺小中来,没什么不好。”诗人渔舟也做了肯定和鼓励:“虽然大家都说他讲废话,但能把废话写出感情,而且诗本人认为他在写诗,那么这就是诗了。”对于这样一个“基本点”,汉家则不以为然:“‘乌青体’的出现,是对诗歌命名的一个尴尬的笑话。如果承认‘乌青体’是诗歌,那么就等于取消了诗歌的基本形态。如果不承认‘乌青体’是诗歌,那对于探索口语实验的诗人无异于一次十字军的讨伐。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不管是梨花体的恶搞,还是乌青体的死灰复燃,简化到一个症结,还是诗歌“标准”的取舍问题,由于“标准”取舍问题没有解决好,隐患无穷。以各种诗歌名义的非诗体、不诗体、无诗体还会屡屡出现,因为大众胃口在娱乐时代永无餍足。

废话体的文本特征,是笔者长期抵制的“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它把诗歌外在的形式特征当成诗歌的全部:只要分行就行了。它将写诗发生学的即兴、随意的一面充分膨胀化,并引向任何角落。固然即兴、随意有性灵的成分在内,然而加入过多的感官娱乐,往往等同顺口溜、对口词、快板、段子之类,变相为信息写作、复制写作、灌水写作、类型写作。

诗人吉木狼格的《消息》这样写道:“六月六号/是普通的一天/早上下雨,中午出太阳/下午开始飘雪,晚上/一场风暴过后有云有光。”许多人大为赞赏,笔者不以为然。简洁倒是蛮简洁,但充其量完全是一天的天气预报。多数这类叙事只是体现了“信息”而已。由此回想起吉木狼格《人群中我想见一个人》:“高处看水/矮处看山/她不高不矮但/很远。”无疑它的简洁蕴藉要远远超过《消息》,一首诗的好坏、高低还是可以判断分明的。

再如诗人何小竹在《芳华横街橡皮吧门口》这样写道:“在芳华横街橡皮吧门口/我看不见/一辆桑塔纳轿车/在倒着走/这时杨黎正从门里/探出头来/我问,这车怎么倒着走/杨黎的头便缩了回去/然后乌青/出现在门口/我又问乌青/乌青看了看,呵呵/他说,那是在倒车。”全诗也是仅仅告诉我们一次“倒车”信息。信息写作再次充满了对诗歌基质的挑刺。现在糟糕的是,把这样只带有日常“信息性”的、缺乏感觉与想象的东西当成好诗,认为只要“呈现”,如实记录就大功告成,无疑是个巨大误区。

还有大名鼎鼎的皮蛋(老头子),垃圾派的创始人,他有些诗作的“诗想”充满智慧和寓言,有过人之处,但有些显然是信口开河的灌水之作。如《一个主义》,笔者实在不敢恭维,全诗如下:“我只相信一个主义/这就是垃圾主义/我究竟/为什么只相信垃圾主义呢?因为它是垃圾主义。”只能说这是一段经不起任何推敲、毫无因果链(或故意抹杀因果链)的强词夺理。设想照这样的非诗性逻辑,若果继续恩怨这样的灌水写作,那么艾青的名句就变成:“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的眼睛常含泪水”。整个诗歌世界,岂不是在无法无天的夏夜中乱了套?

最后再看类型化写作,《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我的银行账号如下:招商银行/6225××××74/郑功宇/建设银行/4367××××13/郑功宇/工商银行/6222××××30/郑功宇/……”这样连续的银行卡排列,还可以无限制地炮制下去。本来借此联排的金融机构可以探视金融危机和民生危机。但过于简化的类型制作,岂知是危险的走钢丝?

当然,如果多一点宽容与辩证,从社会学角度看,废话体的火爆,不啻是单体的恶作剧,一方面可以看成是全民低俗化的合流,是诗歌价值的扭曲与分解,另一方面因现实社会存在太多的谎言,以“乔装”的废话加以反抗,不失为一种方式。不过,我们现在是从诗歌美学角度正视,废话写作挑战了诗歌“底线”。而所谓守住底线,就是基本的价值界限和审美观可以“轻淡”但不可放逐。

重新回到开头,回到文本。当下的废话写作非但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甄别,反而伴随着网络的便捷,不分青红皂白地高涨。后果是“诗人越来越疯癫、诗歌越来越没治”。过分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无技巧、现象学,过分强调呈现就是一切、呈现就是最高内容,过分追求快感和一次性消费,使得随性的“说话”成为普遍“诗意”。诗歌的正常“质地”正在被无遮拦的口水淹没。秉承“只要说出来就行”“怎么说都行”的诗学立场,把说话排分成分行文字,把分行文字直接当成诗歌,导致废话连篇。不但脸不红心不跳,反而振振有辞。重复或接近重复、复制或巧妙套搬、陈词滥调或信手涂鸦、粗制滥造或平面罗列,没有任何压力也没有任何阻力,不启动思想也不屑于技艺,全凭一时快感冲动。从基准的底线考量,“口水诗”低劣的品质是缺乏应有的张力,而没有张力的诗歌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也是诗与非诗的区别。

笔者曾经将网络诗写的症候概括为:游戏性为主要价值的文本观;临屏“一条龙”(写、发、评、编)的写作方式;“无厘头”为表征的美学风格;“脱口秀”兼杂“口水化”的言说语系;“灌水”作为常用的技术手段。

面对这把双刃剑,的确要首选它的正面。在笔者看来,成功的网络诗写,应该是浅显语言中韵致十足,能品味、有余味,而不是一览无余的形式分行,更不是唾沫的随意吞吐、废话的连篇累牍。成功的网络诗写,应懂得恰如其分地控制和施展“看不见”的张力;只有在张力的统摄下,才能实施真正的分行。

从“乌青体”看娱乐时代的废话写作

□陈仲义

## ■新作快评 高晖《煤城往事》,《美文(上半月)》2011年第8期

## 文学具有的“反异化”力量

□张清芳

中篇小说《煤城往事》延续着高晖的“围绕自己独特的心灵成长体验和个体生命经验展开叙述”的叙事特征,以一个敏感、略带青春期忧伤气质的维特式男孩的两年财校中专校园生活的故事为重心展开叙述。如果说此前的《康家村纪事》侧重讲述一个农村男孩在童年、少年时期的内心成长经验,那么《煤城往事》则主要讲述这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后,在城市两年求学期间所经历的内心成长过程及其阵痛。从这个角度来说,《煤城往事》在内容主题上又是《康家村纪事》的续篇和补充。但是,这种延续性并不能遮掩《煤城往事》的独特魅力:语言比《康家村纪事》更加纯熟、流畅,情节安排和细节描写也更具匠心。更重要的是,高晖精准地塑造出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形象,描绘了他对人性异化、生命、死亡、尊严、青春、人生意义等诸多形而上问题的思考、追问和反思,以及他的内在性格在这种追问、反思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历程。这也是高晖本人的主体性意识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从而也使这部中篇小说超越了校园青春故事的狭窄范围,容纳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和思想内涵,充分体现出高晖作为思想型小说家的特征。更确切地说,高晖在为自己编织一部心灵断代史,经度是心灵解放历程,纬度是文本开放的过程,经纬的交叉部分就是依靠高晖的独特的叙述推进。

而在“我”的心理成熟和主体性进一步形成的过程中,文学阅读和创作成为引领“我”前进的精神火炬。在这种情况下,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知识、人生智慧乃至生活经验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亦是青少年在特定年龄阶段了解外界生活的方式。只是高中阶段的“我”囫囵吞枣地阅读文学书籍,几乎是盲目地照搬和模仿世界文学名著中主人公的言行来处理现实生活问题。这种带有维特式色彩处理爱情的方式,显然是“我”心智不成熟的一个体现,亦符合青春期少年的性格特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对文学的理解还停留在生搬硬套的表层,而文学对“我”的引导意义此时也并未完全显现出来。

“我”性格特征的最终形成是在进入煤城的财

校读书之后。“我”带着高考失败的情绪进入这座城市读书——以及童年、少年时期乡村生活给予我的淳朴自然、向往自由的个性,使我能够透过煤城带有“某种特有的神秘和陌生”色彩的表面,用“外来者”的视角冷静地深入其内里去观察和思考。这使“我”发现,城市通过学校职业训练的方式侵蚀、剥夺青少年的自然人性,逐渐把他们异化成没有人性情感的“非人”。换言之,对人性异化问题的思考和反思过程是促使“我”心理成熟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心成熟、迈入成年人行列的同时,亦形成自我的主体性意识,使我能够自觉地去抵抗城市带来的程式化生活对自己产生的人性化和规训。

与高中阶段不同的是,进入煤城后的“我”在文学阅读中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和模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更多融入个人思考和反思意识。文学给予我认清自己内心世界的智慧和力量,“文学不能当饭吃,拿它吃饭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我當時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它的意义大于吃饭”;文学阅读和创作更激发“我”对自我本源的探求,“当时我最想弄清楚的就是:自己的快乐和悲伤所产生的根源,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可以这样来说,文学阅读和创作是一种精神游牧、诗意栖居的举动,是一种保持住“我”内心个性而不被当下同质化的现代社会所同化的方式,是反抗人类人性异化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一种认识自我、思考人生的方式。

从文体意义上来说,《煤城往事》中的叙述编排技巧,无疑也是一种创新之举,拓展着叙事文学特别是中篇小说的内部张力。正如罗振亚所指出的,上述技法和时而上溯时而下沿伸缩自如的叙事时间视角、叙述情感化的“向内转”特质、随意自由的结构语言姿态结合,令人感到《煤城往事》有一种“反文本”倾向,与其说它是小说,不如说它更像一篇凝聚着作者青春记忆的大散文或成长传记。它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传统小说观念对当下创作的束缚,提供了小说文体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动、自如地融合不同的艺术趣味。他们在此次展览上表现出来的共通性,并非基于观念的界分,也非风格的标榜,而是单纯以在思想观念上形成面向未来的深入探讨为己任。赵力表示:“当下的急务不应是立足于当下的应急思考,而应是面向未来的深思熟虑。我们必须面对未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世界观,并超越一切关于流派、激发和趣味的浅表争议。”

(王 兔)

委员会批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之后,《音乐传播》的发展迎来了重要契机,并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创刊的批复。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袁军表示,期待《音乐传播》能够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文化品位,加强与政府和社会的联系,发挥在音乐传播科学研究领域的引领辐射作用。

(范 得)

专家研讨  
一个孩子的战争

本报讯 近日,武汉市文联、武汉晚报社和武汉文学院联合举办了徐世立《一个孩子的战争》作品研讨会。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一个孩子的战争——家庭拯救纪实》中,徐世立以真实而惊人的笔触,记录了儿子从一名优秀的学生滑落为所谓的“另类学生”,被送特别教育学校后,于106天艰辛困苦的磨练中感悟生活、感悟亲情、感悟人生,重建信心、信念和目标,最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全过程。

与会者